



第一章 困境和挑战

1968年4月，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依邀请来自10个国家的30位科学家、教育学家、人类学家和实业家聚集在罗马，探讨人类所面临的发展困境问题，成立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该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了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因石油等自然资源供给的有限性，世界将陷入环境危机和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危机，为避免这一灾难性后果，世界各国需要共同行动起来，改变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以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报告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成书，在全世界卖出了3000万本。

这一报告之所以成为全球最畅销的出版物之一，就是因为它揭示了当时人类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如今的世界，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地球人口已经增长到80多亿。虽然地球所面临的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上的缓解，但是相较于地缘政治带来的危机而言，这些问题还不属于最紧迫和最大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和俄罗斯融入世界的

自由经济和贸易体系之中，从而使整个世界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中国正是在这一趋势下抓住了机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以制造业为龙头，迅速融入整个世界的自由贸易体系，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就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世界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被称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量是中国。与近代以来曾在世界上迅速崛起的国家，譬如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不同，中国是一个有着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东方古国，它并没有出现在近代以来西方史学家或者哲学家所预言的世界历史发展序列当中。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崛起可谓是“二战”以后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一件大事。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经济体量巨大，与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美国在国家体制上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它的崛起在客观上一定会改变既有的世界格局。套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可能使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①。这一变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我们思考当代国际局势的基本前提。

一、地缘政治问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面临的第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地缘政治问题**。美国充分地认识到了中国崛起这一事实及其影响。不过，就像“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所隐喻的那样，它主要是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崛起的。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和现有的世界格局，美国的两大政党，

① 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艾利森提出的一个国际关系理论，指新兴大国崛起威胁现有霸主时，极易引发冲突的历史现象。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的分析，他认为是雅典的崛起以及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导致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对华态度上空前一致，都采取了遏制和封堵政策。自特朗普第一次执政以来，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主动挑起了对华贸易战。拜登执政以来，美国开始联合其在欧洲、亚洲、大洋洲和北美洲的盟友，在高科技、军事和信息等领域对华采取最严格的制裁和禁运政策，甚至威胁要让中国与美国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脱钩”。2025年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更是升级了中美对抗。

按照他的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的说法，中美关系的核心矛盾是过去30年来制造业迁出美国，造成了美国产业的空心化，从而使中产阶级消失，而中国反倒因制造业的成长，中产阶级增多，这些变化倒逼美国寻求改变自己建立的自由贸易等游戏规则，试图通过关税政策使制造业回归美国。2025年4月2日，特朗普以消除贸易逆差为由，签署了关税令，对包括其盟友在内的全球各个国家征收关税，声称4月2日为美国的“解放日”。4月10日，更是针对中国的商品加征了前所未有的145%的高额关税。这一关税政策事实上中断了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彻底改变了国际贸易规则，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衰退的风险。中国当然不可能对美国俯首称臣，放弃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及自己的发展道路。于是，在贸易、稀土和科技等领域也对美国采取了反制政策。再加上台海等不安定要素，中美关系陷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危险的境地。

根据大哲学家黑格尔的“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两个个体“面对面”（face to face）斗争的结果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因一方怕死而以主奴这样的不对等关系结束，譬如1985年美日贸易战时签署的《广场协议》，日本彻底臣服于美国；或者因赌上自己的名誉而陷入生死大战，使一方彻底出局，譬如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但是，中美两国“面对面”的较量则超出了黑格尔所预设的这两种结果。两国经济实力接近，再加上两国都具有使对方甚至使世界毁灭的核打击能力，这就使得两国之间的竞争不能采取战争这一极端的手段，需要双方将斗争控制在可控

的范围内。

在 2023 年 11 月旧金山 APEC 峰会前，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了会谈，重申了管控战争风险和寻求“脱钩”的必要性。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目前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危险程度。由于两国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上的差别，再加上两国实力的进一步接近，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对立态势恐怕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如果中美双方采取赌上国家命运的“面对面”斗争策略，那么整个世界终将会面临分裂、冷战，甚至战争的危险。一旦真正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世界将不堪承受。

除了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以外，当今世界还面临着许多其他的危险。新冠疫情带来全球经济发展滞缓，美国挑起全球贸易战，发达国家正处于高度的通货膨胀当中。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域性战争不仅加剧着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紧张局势，而且因这些战争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等也使世界面临着巨大的衰退风险。如果说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的焦点在环境、能源和南北问题上的话，那么今天的焦点则转向了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和矛盾上。从目前世界的发展趋势和问题的深刻程度来看，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不亚于解决环境问题，且其危急程度和紧迫程度甚至要高于环境问题。

遗憾的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现有的国际秩序却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解决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国际上成立了诸如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机构。从形式上看，联合国是由各个国家组成的国家联盟，但其实质却是各个国家出于自己特殊利益而建立的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当各个国家的特殊利益与全球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它将被国家的特殊利益所取代，很难发挥实际效用。譬如，面对正在进行的巴以冲突，联合国既阻止不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也阻止不了以色列对加

沙地区的进攻。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如此，当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挑起新一轮贸易战时，世贸组织根本无法对其进行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今世界各国还在将世界视为“自然状态”，所奉行的是自我持存优先和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国家主义原理，而非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普遍性原理。因此，要想解决这一地缘政治问题，遏制民族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冲突，就必须找到超越这一国家主义的普遍性原理。这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个紧迫的理论任务。

二、经济失衡问题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问题之外，当今世界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难题，即**经济失衡**的问题。目前，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产业过度集中、货币超量发行、债务规模不断扩大、贫富差距扩大、有效需求不足、普遍产能过剩等现象。这些现象都是经济失衡的表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目前产业过度集中。在科技等核心领域，少数巨头企业如美国的GAF A（Google、Apple、Facebook/Meta、Amazon）或中国的BAT（百度、阿里、腾讯）依靠先发优势和雄厚资本，逐渐构筑起近乎垄断的市场格局。垄断虽带来了效率提升，但也加剧了市场失衡。以互联网科技行业为例，几家龙头企业牢牢掌控着海量用户数据与关键流量入口，新创企业发展举步维艰，市场竞争活力被严重抑制。这不仅阻碍了行业的多元化创新发展，还致使全球经济过度依赖少数产业与企业。一旦这些行业巨头遭遇危机，整个产业链乃至各国经济都将遭受沉重打击，这不利于世界的经济稳定。未来监管与技术变革如AI等，可能重塑竞争格局，但短期内巨头地位仍难以撼动。

货币超量发行已成为常态。为应对经济疲软或危机冲击，如2008年金融危机、2020年新冠疫情等，多国央行频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货币供应量急剧攀升。然而，大量新增货币并未有效流入实体经济，推动生产与就业，反而大量涌入金融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股市、房市价格虚高，看似繁荣的背后实则暗藏巨大金融风险。这种“金融空转”现象加剧了贫富分化，并埋下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一旦泡沫破裂，金融体系将陷入混乱，进而引发全面的经济衰退。

债务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重大隐患。各国政府为维持公共开支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赤字不断累积，国债规模日益庞大，尤其是美国，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 2025 年 3 月美国国债未偿还余额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企业和家庭也因过度借贷，债务负担愈发沉重。希腊债务危机便是典型案例，政府债务违约致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社会动荡不安。过高的债务水平不仅限制了政府和企业的投资与发展空间，还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全球经济稳定。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一社会经济顽疾持续恶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财富分配不均现象愈发严重。根据 Oxfam 年度不平等报告，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拥有 43% 的全球财富，而最贫穷的 50% 的人口仅拥有 2% 的财富。2019—2023 年，全球亿万富翁财富增长 34%，而全球底层 50% 人口的收入仅增长 2%。高收入群体借助资产增值与金融投资，财富迅速积累；而低收入群体则由于工资增长缓慢、就业机会匮乏，生活改善困难重重。这种贫富差距不仅体现在收入层面，还体现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获取上，阶层固化加剧，底层民众向上流动的通道受阻，进而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若无法通过政策改革、教育资源公平化、社会保障强化等手段缓解这一趋势，未来可能面临更严重的社会撕裂与经济危机。

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严重制约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受贫富差距影响，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有限，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导致整体消

费市场需求疲软。企业因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意愿低落，进一步抑制了经济活力。需求端的乏力使得商品与服务的价值难以顺利实现交换，经济循环陷入停滞。此外，普遍产能过剩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表现突出。钢铁、煤炭、汽车等众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企业为争夺有限市场份额，不得不展开激烈的价格战，导致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甚至出现亏损。大量过剩产能不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还严重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经济陷入低效率的恶性循环。

我国也面临着经济失衡的风险，这一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贫富差距扩大**；二是**供需失衡**；三是**冷热交替出现、经济通缩的问题**。首先是贫富差距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均 GDP 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改善，2020 年中国全面消除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的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调查数据，2024 年，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大致在 0.462 左右，这一收入差距水平已经持续了几年，未来一段时间也不存在显著下降的可能性。财产差距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据估计，中国财产基尼系数超过了 0.7，介于美国和欧洲国家之间。除了收入和财产差距之外，中国居民在享受公共服务上也存在着差距，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差距尤其严重。举例而言，很多省份的农村居民养老金，每月仅为 100 多元，而公务员和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接近每人每月 1 万元。

收入差距将给经济和社会带来诸多的负面影响，譬如，贫富差距扩大将削弱社会凝聚力，导致犯罪率上升，引起社会不稳定，增加政府维稳成本和其他社会治理成本；还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抑制消费。当前中国居民消费的疲软，不仅不利于经济复苏，同时也不利于政府倡导

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型。此外，贫富差距扩大还将抑制人力资本的形成和提高，低收入人口缺少资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使经济增长缺少高质量、高技能劳动力，等等。

除了贫富差距所带来的这些弊端以外，供需失衡和冷热交替出现、**经济通缩**也会导致物价波动、经济不稳定和资源浪费。“灰犀牛现象”这一概念通常被用于金融领域，指的是那些大概率发生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中国经济从整体上看也面临着三大“灰犀牛现象”，且这三大“灰犀牛现象”几乎同时发生。一是**美国围堵造成中美冲突**。美国率领其盟友对中国的全面围堵，在世界范围内营造了对中国“小院高墙”脱钩断链的局面。二是**产能过剩和内需不足**。特别是在房地产、传统制造业等领域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日本 20 世纪 80 年代曾出现过房地产泡沫，随着 90 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经济进入所谓“平成大萧条”时代。目前，我国的房地产业泡沫也开始破裂，经济面临着类似于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的发展迟缓风险。就像恒大地产爆雷后那样，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烂尾楼和房地产债务危机。在制造业，因内需不足，也导致很多产能闲置。譬如，中国新能源车行业严重内卷，2023 年库存积压超 100 万辆，引发了激烈的价格战。再加上贸易战的影响，内需不足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总之，在地产泡沫破裂和消费需求萎缩的双重挤压下，企业库存积压、价格下跌，进一步拖累了投资与就业，形成了“供给过剩—需求不足—价格下跌—企业亏损”的恶性循环。三是**经济通缩**。1929 年美国曾经陷入巨大的经济萧条，当时的失业率达到了 30% 以上，股票下跌 40% 以上，城市生活困难，人们从城市返回到农村，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现象。由于新冠疫情和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我国经济在 2022 年以来面临着经济通缩的问题。很多打工族因在城市里找不到工作且生活成本过高，在大城市生活不下去，开始返回自己的家乡。

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它跟世界经济的发展

格局密切相关。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发展迟缓、发达国家的高位通货膨胀，以及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制裁和限制、关税战等，都加重了国内经济失衡的程度。

经济失衡加剧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我国缺少制约经济失衡的中介机制。中国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始经济改革的，在改革中沿用了许多计划经济下的思路，结果造成了政府直接面对市场、直接调控市场的问题。此外，也正是因为如此，政府对于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经济主体很难做到一视同仁，出现了过于倚重国有经济，而对民营经济重视不足的问题。这些都会使民营资本等非国有资本的活动空间被压缩，导致市场信心不足。本来，经济的问题是需要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在现代经济体制下主要是靠健全的市场来调节的。因此，对于目前的经济失衡问题，如何在国家调控之外培育出独立的市民社会以及同业公会等中介组织，建立一种以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平衡经济，就成了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三、中国式现代化

对于中国而言，还有一个**国家现代化问题**。自近代以来，一个民族国家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必须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最早现代化的英国如此，后来的法国、荷兰和德国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亦都是如此，再到后来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家现代化对于后发展国家而言，更是无法绕开的历史命运。100多年来，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一直在谋求自身的现代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提出了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改革开放

以后，我国经过 40 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不仅自身的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市场经济制度、法律体系、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已经与世界深度接轨，成为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近代以来，中国迎来了国家现代化的最好机会。

但是，要想实现国家现代化，对于现今的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历史任务。除了全球分工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国际上的不利条件以外，中国在国家制度上也有两个不同于西方的基本特点：（1）按照马克思和黑格尔对世界历史区域所做的划分，中国属于东方世界，是亚细亚国家，它有着与西欧不同的传统和发展规律，并没有出现在他们所设想的靠内因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序列当中；（2）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成为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要有属于自己的内容规定，即中国式现代化。2022 年 7 月 26—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

我们推进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其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做了规定。

从这一《决定》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与已有的现代化经验有着决定性的差异，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差异是我们